

是什么撑起了《流浪地球》30亿票房

邵岭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核心观点

■ 刘慈欣原著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终极设定,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科幻意义上的新奇感和浪漫感,更完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园情怀;影片最后刘培强“带着空间站撞木星”的自我牺牲之所以能够踩中观众的泪点,也是因为他代替银幕前的人实现了对于舍生取义的向往

■ 《流浪地球》就如同一架探测仪,探测出了身处多元文化语境里的中国人的情感归依,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经典价值观在当代土壤中的根深蒂固。这也是人们将它称为“中国科幻”时“中国”二字的含义

化中的家园情怀——因为背负着地球,这一趟漫漫征程是远行亦是归途;而影片最后刘培强“带着空间站撞木星”的自我牺牲之所以能够踩中观众的泪点,也是因为他代替银幕前的人实现了对于舍生取义的向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片对于当下及未来的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具有启示作用。人们说,文艺作品除了要为大家提供一般意义上

的娱乐与愉悦之外,更应该对于时代重大的精神诉求有所回应。而《流浪地球》就如同一架探测仪,探测出了身处多元文化语境里的中国人的情感归依,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经典价值观在当代土壤中的根深蒂固。这也是人们将它称为“中国科幻”时“中国”二字的含义。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尤其

是面对传统资源和历史题材时的文艺创作,部分出现了强行以现代视角颠覆传统、降格英雄的倾向。在这样的讲述中,程婴救孤不是出于忠义,而是为了替儿子报仇;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动机是暗恋嫂子女……而这些作品没有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现代与传统并非势不两立,尊重、满足和守护大众对于经典价值观的追求,在今天仍然应该是文艺创作的铁律。

当然,《流浪地球》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我们无需回避它的不足——除了那些不够科学的漏洞之外,影片在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和演员表演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刘培强的最后一搏,也因为没有在剧本层面上解决“万一失败了,空间站上保存的人类种子和人类文明也将一并荡然无存”而受到观众的理性质疑。这些都是优秀作品应该避免的问题,也说明文艺作品要想更好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就需要在艺术性上有更高的追求和更佳的表现。

快评

对一部影视剧的热议评说,本来在网络上各自抒情畅怀打星评级是常事。但近日,围绕一部影视剧的“一星大战”却把单纯的文艺评论生态拽回“史前文明”的时代。

争议始于豆瓣网。“一星”增多导致一部剧的评分起伏波动,从上映初的8.5分逐渐跌破8分。新添的“一星”里,固然有真批评,可也不乏“为一星而一星”的盲目偏见。比如,“还没看,一星预定”“平衡一下,给个一星”“讨厌演员,无条件一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随手一星,源自怨气、偏见、傲慢也许还有利益,唯独与观点无关。

不负责任的恶评引来影视剧粉丝抱打不平,“水军控评”“黑粉双标”“有偿差评”等揣测、妄断不胜而走。更有甚者嫌不够解恨,还纷纷扑向各大App商店,再给豆瓣应用打一星。一通报复性打分,发泄情绪,输出愤恨。两个阵营掀起巨大的网络噪音,合辙押韵,无非以偏见对抗偏见。

应该说,任何人都打一星的权利,即便是同一家媒体在对待同一件事情时,都可能站在不同角度阐发不同观点,何况一部影视剧、一个平台。观点可以碰撞,甚至交锋;容得一星的报昏,也受得起五星的膜拜——这是开放包容的时代人人应有的肚量。

但与此同时,容得下一星,不等于默许恶意一星;接受反对声音,不等于纵容恶意的变调。那些在“一星大战”里执迷不悟的人应看到,闹剧底下,没有赢家。于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无端的差评可能导致它失去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于豆瓣,意气用事的一星可能损伤了它的商誉指数;于中国电影,若“一星大战”成为常态,则失去了客观价值的评价体系,失去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创作和批评本就是电影的一体两面,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创作态度;而批评脱离事实,批评的作用也等于零。由电影延伸到任何产品,都需要中肯之言、理性之光,肯定创作的长处,也指出存在的短板。由观众延伸到任何商品的用户,不妨多些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少一些意气用事、哗众取宠。如此,才能回归评价体系的建立原点——以足够多样本数达成客观评价,为更多人提供参考,鞭策更多作品、产品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星大战』伤害网络艺评生态

王彦

“成龙演大文豪谁信”为何一语成讖

王磊

快评

刚刚收官的春节档迎来了开门红,不仅刷新了票房纪录,而且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电影类型的进一步丰富。不过,此前备受关注的成龙主演影片《神探蒲松龄》,票房和口碑却远远未达预期,爆出小小的冷门。

有花甲之年依旧拼命演戏的成龙,《聊斋》又在中国家喻户晓、再加上成熟的画面合成技术,投资数亿元的《神探蒲松龄》看上去手握的每一张牌都具备足够的市场吸引力,为何档期内却没能取得1+1>2的效果?

“成龙演大文豪谁信。”此前成龙的一句玩笑话,与其说是一语成讖,不如说是点中了当下影视改编要害问题所在——仅有话题和流量明星的市场效应,撑不起传统文化改编的票房和口碑。

成龙和他的风格是否符合蒲松龄的形象定位,经过这个春节档很多人已经有了答案。不能否认成龙在银幕上有着精彩的表现,这些年的贺岁档期他也推出过不少叫好叫座的影片。虽然他在尝试转型,但是他在观众“集体审美”中的形象依旧是轻松幽默居多,这和集体审美中同样强势的“聊斋”“蒲松龄”形象显然有一段距离:现实中屡试不第到老才成为贡生的蒲松龄,印在中国观众心中最深的形象,莫过于此前电视剧《聊斋》开篇中那个手持灯笼赶夜路、就着烛火写字的样子。

同时,影片中几个看似熟悉的故事组成的“新编”,偏离了观众重温经典的期待,颠覆了很多人的电影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蒲松龄的名字前面多了“神探”二字?影片中的蒲松龄成了阴阳判官,手握一支神笔,带着一群帮手去捉拿妖怪,并遇上了

“倩女幽魂”故事中的小倩和宁采臣,只是宁采臣和燕赤霞不仅是同一个人而且还是妖怪。一头轻松捉妖,一头苦情恋爱,这样的大尺度改编和融合,很难看出“神探”的用意,也被不少观众戏称为影片改叫“蒲松龄捉妖记”可能更为恰当。

不难看出,虽然演员、题材、投资、技术都具备档期“票房担当”的条件,但是“碎片化”集合方式,让每一张看上去很好的牌没能发挥组合优势,或给影片减分,或让影片输在了起跑线上。近年来也有相似的案例,尤其是将文学经典当作叙事资源进行电影改编时,类似成龙演大文豪的不自信和神探加蒲松龄的生硬组合,都曾引发圈里圈外的热议;诸如唐僧使爱过杨贵妃、孙悟空与“狐妖”之间生出爱情等。有影评人说,一部影片看下来,除了场面、段子,就是明星面孔,剧情和人物几乎没有印

象,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更加无从谈起。

让优质资源“好牌”发挥组合效益,需要回到电影创作的本源——讲好故事。讲好故事,尤其是讲好具有中国审美和价值的故事,越发成为中国电影叙事空间拓展的重要探索方向。随着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与电影工业的长足发展,观众对特效大片的崇拜已经淡去,在仰视变平视的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名著经典的改编,将以中国电影特有的类型面对观众,成为面向世界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而作为这个时代的电影创作者,用好传统文化资源,讲述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故事,才能更好串联起资金、技术、人才。有了好故事,电影就不仅是大众消费的文化快餐,也可以是影像时代传承审美创造美的艺术;不仅是越发科技化的产品,而能成为民族审美和精神的视听艺术载体。

对于海派绘画,是时候拓宽丰满认知了

海派绘画正成为最近长三角艺术展览的热门主题。上海海派艺术馆新近开馆,开馆大展“海上风起——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藏品展”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近现代海派书画珍藏;历时一年筹备的“海派绘画年度研究展”第一回(1843-1927)亮相刘海粟美术馆,从各地借展海派早期近70幅佳作;“海派三人行:任伯年、蒲华、吴昌硕书画精品展”正于浙江省博物馆举办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海派绘画是如何走通市场的,需要一分为二看待

一位学者指出,官方、学术和市场,可谓艺术研究的三个维度,而理解海派绘画,市场这个维度尤其重要。这是因为,海派绘画的发生和发展,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上海,一跃成为新兴的商业化大都市,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新兴消费群体。“海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满足这种商业环境下的大众审美。

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画家前来。他们大多寓居于豫园一带,靠卖画为生,不得不将作品变成商品。比如,当时的上海画家往往注重题材的讨喜。传统文化习俗中的“福”“禄”“寿”“禧”等主题常常使得他们的画作热销。迎合吉利喜庆的大量风俗人物画也开始出现。其中,群仙就是很多画家钟爱的题材。尤以钱慧安笔下的仙女最合时尚标准,眼细眉长,桃腮杏脸,且自有一番福气上涌。据说,钱慧安能在一片月季花瓣那么大的脸型里,控制并排的两条细线,描绘俊秀的双层眼皮,在眼睛上轻轻扫上几笔,还能勾出睫毛来。由于画艺精湛,符合大众口味,钱慧安的画在光绪年间非常流行。一时间,天津杨柳青还采用他的画稿印过大批年画。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走市场的海派绘画需要一分为二看待。深沉,同样是海派绘画不

容忽视的底色。比如,面对当时的国难民生,自立谋生的海派画家们也曾通过绘画来表达内心的态度。对此,艺术史论家徐建融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海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位画家——任伯年和吴昌硕,无不一边按照民间习用的谐音取意等通俗手法,创作着一幅又一幅《玉堂富贵》《无量寿佛》,在强化艳丽色彩和写实造型的审美意蕴中挖掘世俗化的活力,另一边又遵循着个性自由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倾向,在《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饥看天图》《拒霜魄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人文画写意传统中抒发性灵。”此外,致力于慈善事业也可谓海派画家的一个传统。1909年在上海豫园成立的豫园书画善会,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以举行慈善活动、义卖捐赠为己任的书画组织。这个画会最初每年举办一次书画展览会筹集善款,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活动每年多达三四次。鼎盛时期,画会多达两百余人,几乎网罗了当时上海的主要书画家。

说起海派绘画,绕不开它所处的开放、流动的生态

“海派是种气息,我很赞成这种说法。实际上这种气息贯穿着海派当时所处的一种生态,海纳百川、中西交错,上海城市逐渐生长的这么一种生态。”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李超告诉记者。他因此认为,研究海派,不仅要要看前后,也要看内外。上海美术家协会顾问朱国荣也指出,海派其实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产生的一种艺术思潮,它反映了上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中逐渐形

提起“海派绘画”,很多人想到的或许仅仅是“雅俗共赏”“海纳百川”之类有些模糊的概括性字眼,这些字眼却远不能诠释海派绘画的全貌。“看待海派,或许需要跳出艺术史,将其放到更广阔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发展过程中来。”日前上海举办的一个海派艺术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借着近期多个集中展示、系统梳理海派绘画的大展,人们对于海派绘画的认知是时候拓宽、丰满了

成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海派画家的创新精神是在上海这座开放性城市里养成的一种秉性。

被尊称为“海派开宗之祖”的任伯年身上,就留有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子。比如,任伯年在画钟馗等人物的面部时,对所绘对象的肌肉起伏都以明暗烘染,显示出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但整体看起来线条仍流淌出中国的东方韵味。又如,绘画、书法以外,任伯年亦擅雕塑人物小像。几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任伯年存世的雕塑孤品亮相,令很多人大吃一惊——这是任伯年为纪念其父亲所塑的一尊紫砂肖像。任伯年与西方艺术的关系一直是让学界着迷的难题,一方面其作品中中西交融的痕迹很难抹去,另一方面却又有记载否定任伯年学过素描,认为他没有受到西画的影响。

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叉、跨界,是朱国荣提到的海派绘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亦颇能说明当时的艺术氛围。人们熟悉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上海画派朋友圈中的一员。他曾师从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等诸位书画大家,受过正规的训练,其中最为擅长花鸟画。抗战期间,梅兰芳还曾一度蓄须明志,卖画为生。

“海派是文化大熔炉,让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发展空间。”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靳文艺说。在这之中,张大千是一个典型。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张大千来到上海,拜入海派书画家曾熙、李瑞清门下。而后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丹青全部售完,一鸣惊人。正因在上海画坛声名鹊起,张大千职业画家的人生形态从此奠定。

文化视点



(均刘海粟美术馆供图) 制图:冯晓瑜



▲吴昌硕《枇杷图》。

▲张大千《芙蓉彩蝶》。

▲任伯年《添筹图》。

▲任熊《天官赐福》。